

# 面對苦難

● 崇 明

## 一 苦難與專制

中國與現代的相遇是一部充滿苦難的歷史。現代中國經歷了侵略、革命、內戰所導致的國家和社會的解體，遭受了種種重建秩序、改造社會的暴力和激進運動，目睹了種種暴行和災難肆虐於這塊古老的土地。可能是這一歷史讓中國人獲得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承受苦難的能力。張藝謀的電影《活着》(1994)生動地呈現了這一能力：任何苦難都不能壓垮求生的意志，活着本身就意味着對一切苦難的勝利。人們可以為了活着而活着，把活着的意義還原到未加反思的活着本身，把對苦難的承受轉化為在生命絕境下的一種求生本能。然而，這種頑強的求生之所以能夠繼續，其前提是把苦難當成一種不可逃避的必然而加以接受，因此，這種求生與其說是對苦難的承擔，不如說是一種迴避，因為它不但讓人們宿命地忍受自己的苦難，而且更糟糕的是，它導致人們以一種麻木的態度對待他人的苦難。

2010年拍竣、在國內遭禁播的紀錄片《克拉瑪依》的導演徐辛在關於這個片子的訪談中的一段話讓我們看到苦難的旁觀者的冷漠。在訪談中他談到1994年燒死三百多人(受害者大多是中小學生)的新疆克拉瑪依大火對當地人沒有甚麼影響①：

記者：所以基本上除克拉瑪依當地當事的人，其實大部分的人是沒甚麼影響的？

徐辛：對啊，沒影響。我也跟他們餐館裏的人、賓館裏的人包括出租車司機，我也跟他們聊，了解一些情況。他們知道這個事，他們認為這是克拉瑪依的恥辱！而且他們希望盡快把這個事忘掉，而且他[他們]也不希望外面人提這個事。他們沒有人願意講這個事。

記者：都拒絕了你的採訪？

徐辛：對。

記者：你覺得這是為甚麼？

徐辛：我覺得作為他們來講克拉瑪依

是他們的家鄉，自己的家鄉曾經發生過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他們知道是一個很不光彩的事情，而且甚至有人認為這次事件，給他們帶來很不好的影響。他們甚至認為克拉瑪依應該發展的更好，應該發展的更現代化，他們的獎金應該更高，他們的工資收入應該更好。因為這件事他們的工資沒有加，甚麼錢沒有拿到，很多人是這樣的心態，不是一兩個，這具有普遍性。

記者：這個事件的當事人知道其他人是這麼想的麼？

徐辛：這個事件的當事人在當地是受排斥的，當地人是另眼看他們的。甚至他們認為這些人是壞人，這些人按照中國人的說法就是掃帚星，給他們帶來災難的。甚至鄰居會……像其中有一個母親，她的鄰居會羞辱她、挖苦她、諷刺她，因為她的生活待遇很差，收入很低，然後她到一些大市場去買衣服，到菜市場去買那種便宜的菜，鄰居就會笑話她。很多人不願意呆在克拉瑪依，因為呆不下去，他們感覺到歧視。

記者：這種社會氛圍你覺得在你採訪結束時，你覺得它為甚麼會形成？

徐辛：我覺得這不是克拉瑪依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這樣的事件不管發生在北京還是在克拉瑪依，你最終的待遇都是一樣的，肯定是一樣的。

記者：為甚麼呢？

徐辛：不知道！這深層的原因不是我能夠去分析的。再說我也不想去分析這個原因。

訪談中提到的這位母親的遭遇令人吃驚。自己的孩子在大火中喪生，她非但得不到同情和安慰，反而會遭到嘲笑和歧視！徐辛看到這種對苦難的扭曲心態並不僅僅是克拉瑪依人的問題，而是中國的普遍問題。他不願意分析這個問題的深層次原因，但我們卻不得不探究這種對待苦難的扭曲和麻木心態到底如何形成。難道因為有太多的苦難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們就可以因此對自己和他人的苦難習以為常？苦難就是苦難，它不會因為發生得太多而不成為苦難。

很多中國人之所以喪失了對苦難的感受力，是因為苦難的製造者強迫苦難的受害者忘記苦難。不斷製造苦難的專制政治其實對苦難充滿恐懼，它害怕苦難成為對它的指控而對其權力構成威脅，因此在苦難發生之後加以掩蓋、壓制，拒絕對苦難的紀念，甚至要求人們忘記苦難。正是這樣一種製造苦難而又恐懼和壓制苦難的專制政治，塑造了中國人對苦難的超乎尋常的承受能力和麻木態度，因為它使得任何試圖使苦難的受害者得到公義、使苦難的製造者受到懲罰的努力都變得極為艱難。苦難的受害者只能讓自己習慣於苦難，並且通過命、運氣、風水等某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必然發生的力量來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難加以解釋，從而讓自己從苦難的重壓中得到某種釋放，而苦難的旁觀者往往也以同樣的態度來對待他人的苦難。因此，苦難被受害者和旁觀者視為一種必須忍耐、但同樣要加以詛咒的晦氣。

克拉瑪依大火發生後，市政府承諾要將火災現場友誼館重建成火災紀念館，以紀念那些死去的孩子，並警示後人。最後，這一切又是謊言。

1997年，克拉瑪依市政府為了豐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決定炸毀友誼館，在原地修建人民廣場。後來在部分市民的抗議下，友誼館的正面得以保留並被修繕一新，而其他部分都被拆毀。沒有甚麼紀念館。今天，據說這個人民廣場已經成為市民休閒娛樂的地方，晚上會有人聚集在這裏，跳交際舞、耍劍、聊天、鍛煉身體。2000年中央電視台心連心藝術團也曾在這裏舉行了走進新疆大型文藝演出，眾多明星紛紛登台亮相。這場災難，這近三百個死難的孩子，像官僚政治下的一切災難和死難者一樣，淹沒於官僚的謊言和壓制中。威權政治不但在製造死亡後抹去死亡，還把流了鮮血的土地變成歌舞昇平的樂園。在威權中生活，人們必須要學會享受威權所允許的快樂，或者尋求威權縫隙裏的那一點快樂，在其中遺忘一切的苦難、死亡、淚水和痛苦，放棄對真理、道德和正義的追求。人民也往往配合着威權自覺地對身體和靈魂進行操練，滿足於成為自己痛苦的忍耐者、他人苦難的旁觀者。

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曾言，一切都取決於政治，甚麼樣的政府塑造甚麼樣的人民。我們不能忽視政治塑造心靈的強大力量，而政治事實上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在壓抑苦難的政治下生活久了的人們，逐漸習慣於用遺忘代替緬懷，失去了對苦難的憤怒和敏感，也因此正在喪失一部分人性；久而久之，人們被迫在殘缺的人性中習慣於人性的殘缺，以至於終於對人性的缺失扭曲趨於漠然。苦難的製造者可以坦然地拒絕承擔責任，文革中犯下暴行的人堂而皇之地聲稱有權不懺悔。苦難的受害者也常常主動或被動地放棄對正義的訴求，2007年山西黑磚窯事件的受害者在得到一兩千元的賠償金後就滿足了，他們拒絕了免費的法律援助。如果對苦難的順從和麻木成為我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們則不得不對進入我們靈魂的政治力量保持警醒。

然而真正的不幸在於，試圖壓抑和忍受苦難的人沒有看到，苦難不可能在遺忘和迴避中消失，而恰恰是遺忘和迴避將加劇苦難對心靈的戕害，



克拉瑪依大火後，在部分市民的抗議下，友誼館的正面得以保留。

並且使受害者在無法紓解的痛苦中把自己受到的傷害轉嫁給其他人，特別是身邊的人，雖然這種戕害和傳遞可能是受害者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因此，沒有在安慰、承擔、紀念、補贖中得到化解的苦難將成為家庭和社會的重擔，並且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 二 苦難與現代欲望

在一個社會停滯、欲望受到限制的時代，忍受苦難也許還是可能的。然而在一個社會急劇變遷、物欲橫流的時代，在沒有希望的黑暗中忍受苦難已經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於是今天我們看到許許多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被苦難壓垮。這些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戰亂的蹂躪、沒有遭遇過大饑荒的折磨、沒有體驗過政治運動的殘酷，但他們參與創造的前所未有的繁榮卻讓他們感到前所未有的絕望。他們當中的「強者」向社會報復，「弱者」則只能選擇自殺。最近發生的殘殺兒童和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告訴我們，赤裸裸的現代性所造成的苦難甚至是習慣於忍受苦難的中國人也無法忍受的。

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表面上已經是一個繁榮的國度，正在告別近代以來貧窮、落後、劇烈的政治動蕩所帶來的種種苦難。然而，在這個被國民的辛勞和汗水所滋養的繁榮國度背後，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對勞動的榨取、對權利的壓制乃至剝奪、專權產生的腐敗、貪婪製造的道德災難、不公正和不平等所激發的仇恨、社會紐帶斷裂和價值崩潰造成的精神空虛和絕望。我們不能忽視那些在現

代工業生產的大機器中被異化為沒有靈魂的工具的年輕勞動者，如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所說，當他們作為工人愈發完善時，作為人則愈發被敗壞。而更為可悲的是，他們以健康、尊嚴和人性為代價所換來的不過是一點微薄的收入，而憑藉這點收入，亦無法在那些他們渴望棲息的城市獲取能夠擁有最基本的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然而他們已經沒有家鄉可以接納他們的孤獨和疲憊、給予他們尊重和關愛，只能在這個世界上承受被拔根而帶來的無依無靠。沒有正義、道德和精神的維護，在赤裸裸的物質積累所堆砌的中國現代性的繁榮中，一種更為沉重、更令人絕望的苦難正在形成和積澱。

在中國，靈魂面對苦難依然能夠加以忍受的一種途徑是讓自己沒有靈魂。確實，只有讓靈魂麻木甚至失去靈魂，苦難才會失去對靈魂的控制。不過，讓靈魂麻木或者試圖喪失靈魂只能是對靈魂的扭曲，因為人失去靈魂只能意味着人性的敗壞。然而，在一個靈魂被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欲望所攫取的時代，失去靈魂也變得非常艱難，因為只有失去了欲望才能失去靈魂。而中國的赤裸裸的現代性就是一個完全被沒有限制的欲望所支配的現代性，在這樣的現代性中失去欲望，這無異於要求人們自己拔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殘殺兒童和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告訴我們，對苦難的中國式忍耐已經不能幫助中國人面對赤裸裸的現代性所造成的苦難。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並非「80後」、「90後」的年輕人缺少抗壓能力的表現。沒有多少人能夠在欲望和絕望的撕裂中活下去。

自殺和報復社會的暴力都是社會危機甚至是社會解體的預兆。當一個社會中愈來愈多的人被其製造的苦難吞沒時，當這個社會中人與人的紐帶已經不能幫助這些被傷害和踐踏的人時，這也就意味着社會在崩潰、缺席，而社會的退場意味着自然狀態的出現、意味着暴力將成為這個社會的法則。

社會重建的可能何在？社會一方面被國家和政治權力塑造，另一方面也有其自我建構的功能，有其自身的政治。對這種建構和政治可以給出種種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實證和理論解釋，不過筆者願意把它理解為一種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友愛。亞里士多德告訴我們，城邦僅僅有正義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友愛；如果人們都是朋友，正義可以得到更為自覺的維護，城邦的公共善 (public good) 亦能更好地實現。在當下的中國，推動國家和政治權力趨近正義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使命，而普通公民以友愛去對待身邊的人，特別是那些受苦的人，這應該是多數人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在正義被扭曲的社會裏，友愛難道不是同樣非常艱難嗎？因為，當公民在聯合中尋覓和踐行友愛時，他們不同樣要遭到各種打擊而被驅散和迫害嗎？沒有正義的社會，友愛也將遭到壓制。然而，恰恰在缺乏正義的社會裏，我們才迫切需要培育友愛，並且通過友愛來重建正義。

所幸的是，近三十年的發展已經使權力不再能夠隨意控制社會。也許，中國社會的潰散當中恰恰孕育着未來的希望，因為當社會不再能夠期待由國家實現其需要時，社會將尋求自身的政治、道德、精神的行動和表

達。維權運動和近來工運的萌生、非政府組織 (NGO) 的發展、宗教的成長，在這些艱難的努力中我們看到了一種讓現代性在中國變得美好的正義與友愛的萌生。社會對抗權力的腐敗和專斷以謀求正義，公民組織起來在互相幫助，特別是對受苦的人的幫助中踐行友愛——筆者相信這兩個彼此密切關聯的方面構成了中國未來的希望。當正義和友愛成為中國社會的自覺意識時，我們才擁有自主的個體和真正的主體性，或者說我們才會在面向他人的責任中承擔起自我的獨立和自由，我們也將以新的精神面對無法逃遁的苦難和痛苦。

### 三 苦難、正義與愛

在所有這些建立正義和友愛的行動中，我們看到有一些人用一種奉獻和犧牲的精神來面對中國社會的苦難。他們的努力不僅僅是為受苦的人提供幫助，而且是以共同承擔苦難的方式來傳遞責任和愛。

德國志願者盧安克 (Eckart Loewe) 給筆者的感動和啟發不僅僅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震撼。他把在一個中國貧困山村進行教育實踐作為他的職業，在這個選擇中，筆者看到他身上有一種個體生命的自主意識，並且他試圖在和這些孩子的生命的關聯中把這種自主意識傳遞給他們。首先他觀察到，那些不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留守兒童會變得非常好鬥和野蠻，於是他到這些孩子家吃飯，與他們一起生活，讓成人的文明來約束放任的兒童本性中的野蠻。他的觀察告訴我們，家庭是文明的紐帶。家庭是社會

和政治的基礎，沒有家庭的社會，或者家庭價值被淡化和破壞的社會，是一個可能墮入野蠻的社會。在他的教育實踐中，他認識到中國教育的主要問題是按照社會的標準而不是孩子生命的內在需要來塑造孩子，於是他選擇了和孩子一起玩的方式來讓孩子去揮灑他們的天性，並且他也試圖把學習變成一種「玩」——這一點在他的很獨特但在中國卻無法成功的英語教學中體現出來。他認真對待每個孩子的手工和藝術習作，讓學生一起畫一幅共同的畫，既可以發揮自己的想像又要學習合作；通過一些小事，他告訴我們孩子雖然很小，但他們也會因為感到被刻意影響或者因為感到被利用而受到傷害。他和學生一起設計橋樑道路並且促進村民自發組織起來修路，而不是一味等待上面的安排。這是一個會讓托克維爾讚嘆的行動，因為民主的美國和中央集權的法國的差異，正體現在當道路毀壞了時，美國人會立刻自發組織起來修路，而法國人則會等待政府的干預。民主的真正意義正在於自由公民的自主和團

結。通過培養孩子的自主和團結，盧安克的教育實踐可以說是一種公民教育。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盧安克沒有通過成立某種機構和通過某種宣傳來傳播其教育理念，而是選擇了在一個貧困的地區和那些被忽視的孩子一起生活，通過這種方式把教育變成一種聯結生命的生活。他的教育首先是和受苦的人一起受苦。他的一句話讓筆者震撼：我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連在一起，分開了就沒有命了。在這裏我們感到他對這些孩子的深深的愛。沒有這樣的愛，沒有這樣一種生命聯結的意識，很難想像一個在歐洲福利國家的安全和舒適環境中長大的德國人能夠在一個貧窮的山村長期陪伴和教育這些被人遺忘、本來沒有甚麼希望的孩子。在他的思考和行動中，筆者看到民主的自主意識和某種宗教精神——這種精神特別體現於在愛中與他人共同受苦的選擇。或者我們可以說，一種出於宗教精神的愛和一種出於自由精神的責任讓盧安克能夠去面對和承擔一群外國孩子的苦難，而這些孩子本來和他沒有甚麼關係<sup>②</sup>。

在創辦公盟（北京公盟諮詢有限責任公司）為中國人權和憲政奮鬥的許志永那裏，我們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一種在面對苦難時以愛的精神追求正義的超越意識。許志永看到，在面對中國人正在經歷的苦難時，必須同時具有愛的能力和公民的責任，必須讓愛成為正義的夥伴。在2010年2月和上訪者的一次座談中，他的講話令人震撼，這個講話的標題即為「愛，在通往正義的路上」<sup>③</sup>。在這個講話中，我們看到一種面對苦難的不同尋常的態度，這種態度可能會超出很多中國人的接受能力，因為他提倡人們



盧安克的著作《與孩子的天性合作》書影

以愛面對苦難，不僅愛那些苦難的受害者、那些為社會奉獻的人，甚至愛那些「傷害我們的人」，包括「那些打人的警察」、「黑監獄的打手」。他知道和上訪者談這樣的話題有些殘酷，然而他堅定地說：「是的，我們愛他們，愛每一個人。」

或許有人會覺得許志永的想法過於理想化，甚至過於幼稚。確實，應當承認在沉重的冤屈下掙扎的受害者對正義和報復的渴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總是在仇恨和憤怒中煎熬的心靈也很可能受到仇恨的戕害和扭曲。仇恨不可能在仇恨中被化解，心靈只有獲得超越仇恨的力量才能不被仇恨捆綁。筆者想，許志永確實深切地體會到了苦難對於這些上訪者的沉重折磨，他們的冤屈得不到正義的昭雪，被迫在無法釋懷的仇恨和對苦難的壓抑中繼續艱難的生活。他也知道這些上訪者獲得正義的道路是何其漫長，可能性也何其微薄，而如果沒有一種超越的力量，他們在得到正義之前也許已經被他們的痛苦壓垮了。因此，「愛那些傷害我們的人，這種〔是〕一種痛苦的選擇，在漫長的上訪路上我們經歷了如此多的磨難，在尋求正義的路上，我們遭遇歧視和誤解，我們隨時失去人身自由，遭遇野蠻暴力。可是，我們必須超越苦難，超越自己在此生的苦難，必須以一種新的感悟面對我們的命運，不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所有同胞的自由和幸福。」

筆者不知道和許志永座談的上訪者是否能理解他的講話、是否能理解和相信這種超越。但是筆者相信這是他對自己的行動所承擔的精神意義的理解。為了同胞的自由和幸福，在愛

中實現對苦難的超越，這至少應該是他賦予自己的使命。面對中國社會瀰漫的暴戾之氣，他拒絕以暴力對抗暴力，而是堅持「用自己的承擔、自己的受苦喚醒人性中善良的一面，直到這種善良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讓那些暴虐的氣息蕩然無存」<sup>④</sup>。他講述他自己在挨了打之後，可以平靜溫和地嘗試和打手交流，通過這些交流，他讓人們看到即使這些壞人也有是非之分，用他的話說，「即使再壞的人，內心也有善的一面，那是上帝植於人類內心深處的良心的種子。」他看到在中國有太多的仇恨和敵意，只有愛才能加以化解，從而幫助人們克服橫互在他們之間的鴻溝：「我們的使命是尋求人性中另外一種力量——愛的力量，只有人性的這一個極端才能戰勝敵意和仇恨的另一個極端。」他認識到，面對中國的暴力和苦難，需要一部分公民以犧牲的精神來喚醒國民的良知和善。

筆者想，許志永深知他的使命的艱難，因為他認識到愛不是弱者對憐憫的乞求，愛絕不只是一種激情，而在他看來，愛意味着「信仰」、「同情」、「寬容」、「謙卑」、「誠實」、「奉獻」、「責任」。這種愛顯然需要一種宗教般的信仰作為支撐：

愛是信仰。愛世人，愛每一個人，是我們永遠堅守的信仰。每個人心中都有愛的種子，愛能激發愛，愛能超越恨，只有愛才能融化這冰封的大地，才能拯救同胞於冷漠和仇恨的地獄。無論我們是否宗教徒，在這個世俗的社會上，一個自由、公正、仁愛的社會就是我們的信仰。我們的使命是愛，用愛激發所有人的愛，建設一個

充滿愛的人世間，這不光是為了我們自己，更是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

許志永理解的愛是有勇氣和理性的公民對於公民責任的承擔；而在當下的中國，這一責任意味着成為對一個嚴重不公正的社會的抗爭者：「嚴重的社會不公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常態。絕大部分人默默忍受。但是總得有人站出來，我們就是那率先站出來吶喊的公民。」在他看來，這種抗爭不是對抗，而是出於對寫在憲法上的神聖權利的相信，是出於對良心和正義的堅守，出於建設美好社會的理想，出於我們對生長在其上的土地的愛。因此，「無論經歷了多少苦難，在通往正義的道路上，我們的使命是愛，愛這個國家……能夠帶來一個美好社會的，只有愛。只有愛才能消融仇恨和敵意，只有愛才能喚醒每個人內心的愛，只有愛才能讓我們彼此溫暖，只有愛才能真正改變這個國家——這個漫長的專制歷史陰霾的國家。用我們的愛消融這冰封的大地，用我們的愛澆灌每個人內心深處絕望的種子，用我們的愛建立一個自由幸福的國家，為了我們子孫後代的一個自由幸福的國家。」這種愛並不抽象，在許志永那裏，就是以建立正義、民主、自由的社會為目標的公民政治。許志永試圖告訴中國人，政治可以不是權力鬥爭、不是陰謀和暴力，而可以是一種美好的精神和行動。真正美好的政治必須以一種偉大的信念和堅韌的責任為基礎。

本文一再引用許志永這些震撼人心的話，因為筆者相信在一個人用自己的行動和他人一起承擔苦難的人那裏，這些愛的表達是真實的。在盧安克和許志永通過愛和責任來面對苦難

的努力裏，我們找到了一種在中國承擔苦難的新的力量，我們也看到這個古老的國度擺脫苦難重壓的希望。

加繆 (Albert Camus) 在〈杏樹林〉中寫到：「無法否認，我們生活在一個悲劇時代。但有太多的人混淆了悲劇和絕望。勞倫斯說過：『悲劇應當成為踢向苦難的重重一腳。』這是健康的，即時行動的思想。今天有太多的事物需要這一腳。」<sup>⑤</sup>這位存在主義者在「用潔白和活力對抗猛烈海風的杏樹林」中看到了品格的力量，然而西西弗 (Sisyphus) 式的努力、某種個人英雄主義的情懷不能成為這一腳，只有獲得拯救的悲劇、通向自由的責任和行動、以友愛追求的正義才能在苦難中讓我們「在冬天的世界準備明天的果實」<sup>⑥</sup>。

#### 註釋

① 參見 [www.hudong.com/version/view/hfmBmR0dnAn5lcHJ7Z,m,9HQA](http://www.hudong.com/version/view/hfmBmR0dnAn5lcHJ7Z,m,9HQA)。

② 參見《志願者盧安克》，中央電視台「面對面」欄目，2009年12月27日，央視網，<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61927120929889>。

③ 許志永：〈愛，在通往正義的路上〉，一五一十部落，[www.my1510.cn/article.php?id=fdc86f4ba9e0616b](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fdc86f4ba9e0616b)。下文引用的許志永的文字均出自此文，不再另註。

④ 參見 <http://zh.wikiquote.org/zh/%E8%A8%B1%E5%BF%97%E6%B0%B8>。

⑤⑥ 加繆 (Albert Camus) 著，錢翰譯：〈杏樹林〉，《北京大學研究生學誌》，1997年11月，頁61。

崇 明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  
研究院副教授